

Ancient Statues of Buddha in China

艺苑畅游丛书

王其钧 著
Wang Qijun

至尊佛陀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Ancient Statues of Buddha in China

Wang Qijun

王其钧 著

至尊佛陀

艺苑
畅
游
丛
书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至尊佛陀 / 王其钧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7
(艺苑畅游丛书)

ISBN 978-7-5366-8879-7

I. 至… II. 王… III. 佛像 - 石刻造像 - 中国 - 古代

IV. K87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4346 号

至尊佛陀

ZHIZUN FOTUO

王其钧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王其钧 郭 宜
责任编辑 郭 宜 杨 帆
责任校对 李小君
装帧设计 刘 薇 陈 奎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 14.75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5 000

ISBN 978-7-5366-8879-7

定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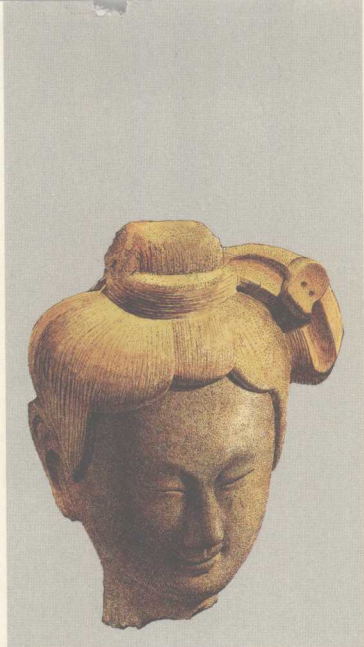
在我国古代各种艺术门类中,雕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艺术门类。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与西方雕塑艺术完全不同的审美观念和造型艺术形式。其中,佛教雕塑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中,又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在流传至今的古代大型雕塑作品中,佛教雕塑在数量上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在相当的层面上,佛教雕塑代表了中国古代雕塑的最高水平。

以雕塑作为强有力的艺术宣传形式,佛教重视利用各种雕塑手段,包括石雕、石雕敷彩、泥塑彩绘、木雕、瓷雕等多种工艺形式,创造出了相当多的雕塑艺术作品。在大型佛教雕塑中,石窟造像、摩崖造像、寺院造像是最富影响力的三种形式。

中国佛教雕塑艺术在东汉佛教传入后即有作品产生,其艺术脉络一直延续至今。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了解佛教造像在中国产生的背景,佛教造像由外来文化而逐渐民族化的过程,古代艺人匠师在当时条件下努力创造奇迹的历史等内容,对于今天中国雕塑艺术在民族文化的风格下继续发展,将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及指导意义。

王其钧

2006年3月于中央美术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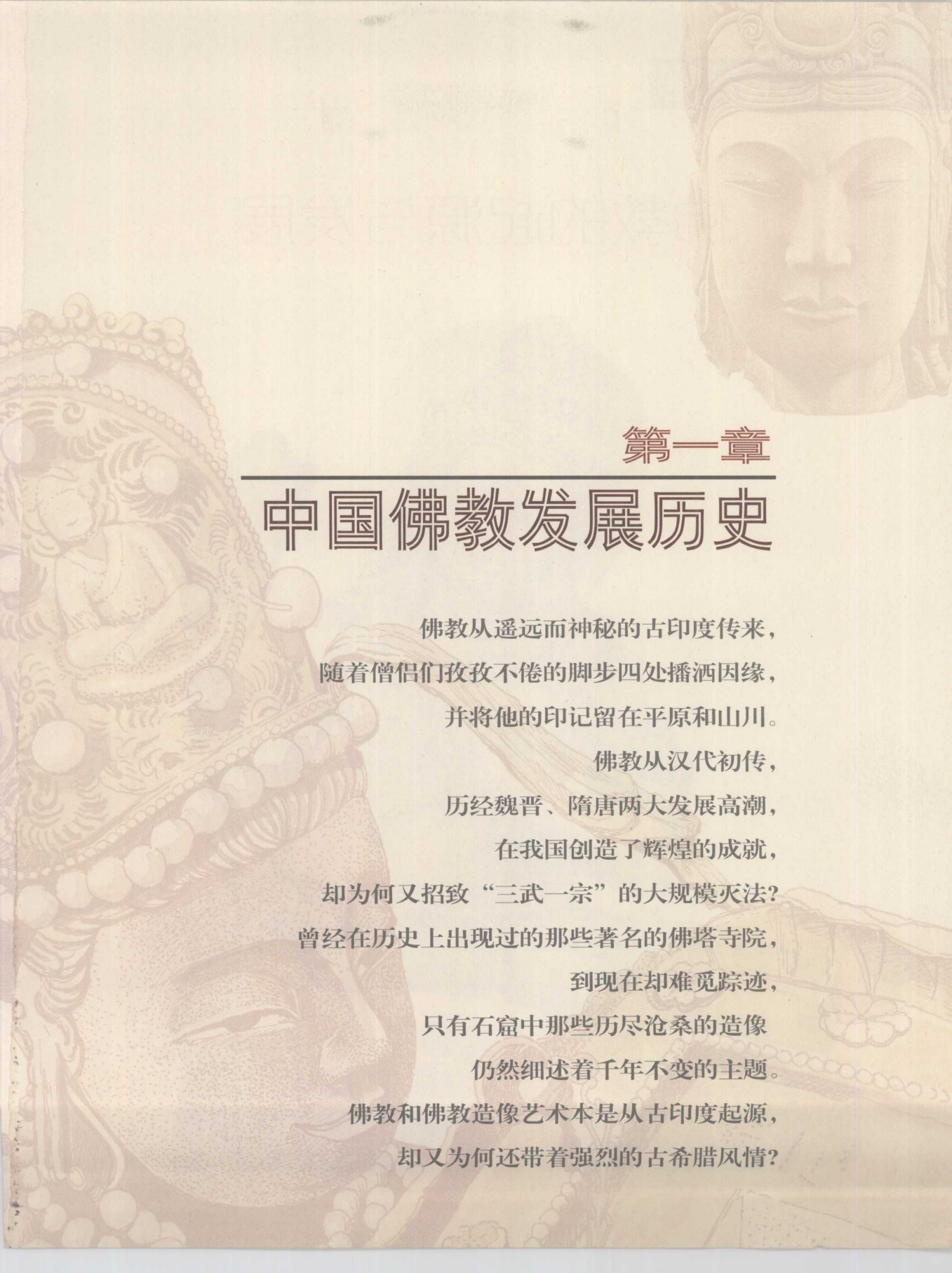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1	第一章 中国佛教发展历史
2	佛教的起源与发展
5	我国佛教的早期发展
17	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
29	我国佛教后期的发展
43	第二章 中国佛像概述
44	佛像的产生
45	佛像的分类
71	佛像的形态
85	制作佛像的材料

95	第三章 中国石窟概述
96	中国石窟造像的分布
101	云冈石窟
116	天水麦积山石窟
131	龙门石窟
147	敦煌莫高窟
166	大足石窟
183	第四章 石窟雕塑艺术
184	早期石窟及造像特色
194	盛期石窟及造像特色
207	石窟及造像的后期发展
209	后 记
210	参考书目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features a large, faint illustration of Buddhist statues. In the upper right, there is a close-up of a Buddha's face with a serene expression. On the left side, there is a more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seated Buddha figure, possibly in a meditative posture, surrounded by ornate carvings and decorative elements. The overall style is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with a warm, aged color palette.

第一章

中国佛教发展历史

佛教从遥远而神秘的古印度传来，
随着僧侣们孜孜不倦的脚步四处播洒因缘，
并将他的印记留在平原和山川。

佛教从汉代初传，
历经魏晋、隋唐两大发展高潮，
在我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却为何又招致“三武一宗”的大规模灭法？
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著名的佛塔寺院，
到现在却难觅踪迹，
只有石窟中那些历尽沧桑的造像
仍然细述着千年不变的主题。

佛教和佛教造像艺术本是从古印度起源，
却又为何还带着强烈的古希腊风情？

佛教的起源与发展





婆罗浮屠上的佛像

1-1-1 (左页图) 佛教传播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并与各地的本土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有地区和国家特色的佛教形式。左页图为爪哇岛上的早期佛教造像,从其袒露皮肤的衣着形式和姿态可以看出古印度佛像的传统,这与我国早期佛像颇为相似。但佛像的面部和头饰则明显具有当地特色,是过渡时期的佛教造像形式。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今天印度、尼泊尔境内),由释迦牟尼创立,而释迦牟尼的名字在梵语中就是“释迦族的圣人”之意。佛在梵文中是“佛陀”的简称,又被译为“觉者”,是指不仅自己觉悟,还帮助他人觉悟而且觉行圆满的佛。普通人是没有这三种觉的,只有通过不断的修行和磨炼才能成佛。最早的佛是对释迦牟尼的尊称,后来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和教派的分裂,才形成了诸多的佛。(1-1-1)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大约可归纳为几个阶段,即早期释迦牟尼创立,其影响日渐扩大,包括释迦牟尼死后,他的弟子和信众还秉承其遗志,不断召开各种说法论道的会议,将释迦牟尼生前的言论和思想进行归纳和整理;中期,佛教又经过了两次分裂,第一次是围绕该不该严守原始佛教戒律,该不该让佛教的有关律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从此佛教分为坚持原始佛教规定的上座部,与认为佛教的教义也应该随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的大众部。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众多其他的小分支和流派。众多流派围绕着这些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宗教理论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戒律等;在各流派并行发展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佛教逐渐发展为两大教派,即以普度众生,帮助普通人得道成佛为宗旨的大乘佛教派,以及以主张个人通过修行得到解脱的小乘佛教派。此后,大乘佛教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成为佛教主流;后来,受新婆罗门教的影响,大乘佛教开始向着秘密佛教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印度社会的主流宗教——密教。

在释迦牟尼去世后300年,古印度史上的阿育王朝逐渐强大统一起来。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与推广,佛教也开始向外传播,传至中亚、西亚以及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各国,佛教逐渐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宗教,而东亚各国相应的佛教造像艺术也开始结合各国本土艺术形式逐渐发展起来。(1-1-2)佛教大约在两汉时期传入我国,此时期即是印度佛教逐渐分裂为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时期。当时佛教已经传入西域的大夏、大月氏和安息等国,而汉朝积极推行对外交流,尤其是张骞打通了与西域各国联系的丝绸之路以后,使佛教以及各种佛经逐渐传入汉地。

根据地区性来区分,我国佛教的传入与发展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由印度南下经缅甸、泰国、老挝等国传入我国南方,以傣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二是由印度北上经西域安息、大月氏等国传入新疆,并由此传入汉地,并在大江南北不断发展壮大;三也是由印度北上,传入西藏地区,并由西藏传入到蒙古及其以北的西伯利亚地区。随着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其影响日益扩大,佛像的发展也相当迅速,并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佛教最初只是一种流行于皇族、贵胄、官宦等上层社会的宗教,而且多聚集在当时局势比较稳定的洛阳及广大南方地区,尤其以广州等地最为兴盛。

佛像传入我国后迅速而蓬勃地发展起来,随后还经由我国传到了日本、朝鲜半岛等地。由于这两地佛教的发展同我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其佛教造像上也深受我

国的影响，从这两国的佛教造像中都能够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中国风格对其的影响。

早期的佛教多侧重于对佛经的翻译，以使得其教义与思想为汉地民众所知晓，与佛教的发展相同步，各地也开始了对佛经的翻译与传播。不仅如此，各地还出现了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佛经读物和佛经注解，甚至还将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化相结合，开始了佛教本土化的进程，佛教思想因而得以快速发展，其信众也日渐增多。从佛教的发展历史来看，我国佛教发展有两大鼎盛期，一为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这是我国佛教不断发展到成熟的关键时期；一为隋唐，尤其是唐朝时期，是我国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佛教与本土佛教艺术的时期。

般若波罗蜜菩萨坐像

1-1-2 (右图) 泰国、菲律宾等地的佛教也极富有本地特色，这里的佛教同当地的土教相结合，其丰满的乳部就来自于丰育女神的形象。此外，佛像袒露上身，着华丽的头冠、佩饰和衣裤，这些又都来自于当地贵族的服饰。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佛像在各地都经历着一个本土化发展的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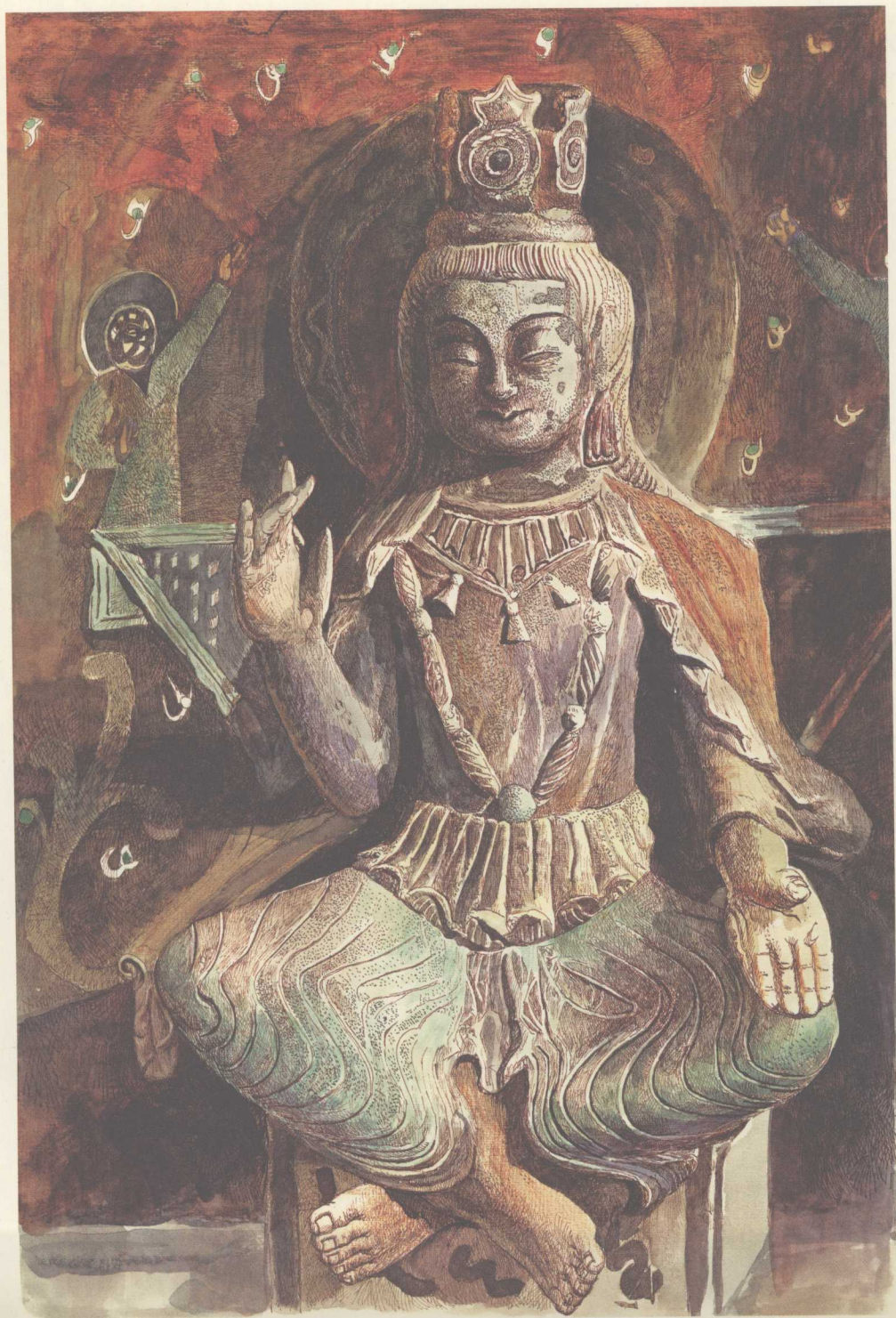
我国佛教的早期发展

自东汉末年开始，随着一些佛教僧侣在内地的传道与翻译经文活动，使人们对佛教从了解到日渐加深印象，到逐渐接受，佛教开始真正在华夏大地上发展起来，而与佛教相关的一些佛教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从佛经的翻译上来看，西域诸国的传道者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们大多通晓多国语言，这样才可能将源自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此外中国本土的学者还与这些域外高僧一起将中国传统的儒、道及其他一些人们所熟知的学派与佛教相互融合，利用一些本土的名词来解释佛法，使之更易于被中国理解，从而为佛经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其次，这些域外高僧也带来了一些异域像，这既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也成为我国初期造像摹仿的对象，但这种摹仿并不是在完全复制，而是建立在与我国传统艺术风格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1-2-1）



石雕菩萨头像

1-2-1（左图）各个朝代所雕刻的佛像都有其各自的时代特色，这些特色表现在佛像的体态、动作、衣着等多个方面。菩萨像是佛像中变化最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图为东魏时期的菩萨头像，菩萨的发式和面部已经完全转化为汉地妇人的形象，且更加精美，面部表情也更和善而亲切。菩萨像面部细眉、细眼和薄嘴唇的形象是符合当时人们审美观念的产物。





莫高窟 275 窟

1-2-2(左页图) 由于我国佛教是从古印度经由西域各国传至内地的,因此早期的佛教造像同时呈现出古印度、西域和汉地三处的特色。图中北凉时期的菩萨造像就反映了这一特点。菩萨面部为汉人样貌,但身穿胡服,而其雕刻手法则采用了古印度式的湿衣褶形式。在佛教的影响下,汉地人们开始逐渐了解异域和外族文化,并有选择地将其加入到汉族文化当中。

三国时期,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佛学思想,尤其以研究《般若》为代表的般若学已经形成一门单独的学问,各地也都兴起了讲经论道的场面,甚至还有人专程赶往西域以求取佛经。但此时的佛教还只限于上层社会,还未被社会中的中低阶层所广泛认识。此时较有代表性的高僧是昙柯迦罗,他是一名来自印度的高僧,主要居住在洛阳城中从事翻译经文和规范僧侣行为的工作,尤其在翻译和制定僧侣规范方面成就突出。而在吴国则有被孙权拜为博士的支谦,他本为大月氏人,从祖上即迁入汉地居住,因此通晓多国语言,他成功地翻译了《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等。此时期像昙柯迦罗和支谦这样致力于佛经的翻译与编纂工作的人有很多,他们翻译与制定的大批佛教经文与僧侣规范也使佛教趋于制度化,而且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和新看法也更贴近于普通人,这些都为佛教以后大规模的发展作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西晋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在此时,佛教却开始得到统治者和上层人士的普遍推崇,因此无论是知名高僧还是相关佛教典籍的数量都有所增加。西晋之后,北方各地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中原地区随即陷入了长时间的混战时期,政权交替频繁。但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却都积极吸取汉文化之所长,也仍然保持着崇佛的传统,大力提倡佛教。根据当时的记载,每朝都有征集各地高僧讲法、支持佛经的翻译工作、大力兴建佛寺建筑的活动,而且汉地对佛教的尊崇还吸引了大批域外僧侣转入内地讲经说法,在此时期各地都出现了大批的知名高僧。各地的割据政权境内大都兴佛教、建佛寺、塑佛像,佛教也开始从上层社会向广大民众发展,成为统治者安定局势、稳定民心的手段。(1-2-2)而此时的佛教也对各地区以及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交流,增进相互间的理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此期间,北方的西晋和十六国也涌现出了对佛教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人物,这其中尤其要提到道安与鸠摩罗什。道安本人博学多才,在诗词歌赋方面颇有建树,这使他在佛经的翻译和归纳方面更加得心应手,也使得佛经更易于被中国人所接受。他对我国佛教的发展主要有三大贡献:第一大贡献是总结了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他经过自己的翻译与研究,不仅整理出大量的佛教经典,还自行编纂出佛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一书,收录了佛教自东汉年间传入所译的佛经及其译者,从佛经及佛教文化的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对佛教文化作了总结;第二大贡献是制定了僧尼的规范,并设立一姓制,他制定了详细的僧侣日常修行及活动的规范,并创立了中国早期大规模的僧团组织,还规定出家人一律废除原有姓氏,统一以“释”为姓,制定了僧伽制度;第三大贡献是培养和教化了数量众多的弟子,这些弟子不仅散播到各地成为当地的佛教领袖,其中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高僧,将佛法弘大发扬,其影响极其深远。除了这三大贡献以外,道安之影响日重的原因还在于,他倡导佛教必须依国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明确了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要作用,将佛教赋予了较强的政治性。这种学说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统治者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因此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使之得以迅速发展。

鸠摩罗什也对佛教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在统治者的支持下,他主持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并且在翻译过程中不仅注重对音与意的翻译,还特别注重语言的文学性和流畅性。他将佛经的翻译从一种分散的个人行为,转变为一种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组织性活动;其次,鸠摩罗什并不

华盖鎏金铜佛像

1-2-3 (右图) 此尊为十六国时期的铜铸佛像，是我国初期的佛教造像形式。此时的佛像已经被供奉起来，并形成了高肉髻、头光和有双狮胁侍的形式。从佛像所着僧衣可以看出，总体上还保留着印度式的湿衣褶形式，但已经转化为汉地服装样式，而且华盖的设置也是为当时贵族所专用的。

四足方基 图示佛像由宝盖、头光与背光、佛像以及底部的四足方基共四个独立的部分组成，各部分都在中轴处留有插杆或孔洞，最后拼接成整个佛像。宝盖与头光之间利用宝盖的撑杆自然过渡，而背光则插于佛像后部，最底部四足方基上也雕刻同样的水波纹装饰，这样与宝座及身光上的水波纹相对应，给人很强的整体感，而忽略了接口部分。

华盖 佛像顶部的华盖由一根细铜柱与底部头光相连，华盖为铜片锤打而成，呈向内凹陷的圆形。华盖四周的边缘，每隔相等的距离还设有通透的眼洞，据推测，华盖下应该有流苏样的垂饰，而这些流苏就应当系在这些孔洞之中。

头光与身光 佛像后部的头光与身光为大小重叠的两个圆形，采用浇铸的方法制成。头光共分内外三层，中央空白的圆盘为第一层，第二层为重复的莲花瓣形式。身光也分为三层，其内部的圆形与头光最外层相接，都以线刻的手法雕刻水波纹，使整个雕像充满动势。

宝座 佛像端坐于两边带扶手的宝座之内，这种形式的台座在石窟及后期造像中都比较少见。我国魏晋时期的汉地还普遍采用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而这种较高的座椅形式、座椅两边的狮子图案也同佛教一样，属于外来式样。





是只单纯地翻译佛经，他还是一位思想深邃的佛学思想家。他在翻译佛经的同时也加入个人的一些认识和观点，同时对佛经进行评论，敢于提出一些惊人的批判之语，也掀起了对佛教教义的大讨论；最后，与道安一样，鸠摩罗什也培养了诸多优秀的弟子，这些人不仅精通佛经，而且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也有相当深入的认识，这就使得他们所译经文与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合在一起，他们与鸠摩罗什一起，发表有关的论文，为我国佛学思想与佛学思想的研究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随着这些高僧传法、译经活动的影响日益扩大，十六国时期各个国家的崇佛热情也逐渐高涨起来，此时对各式佛像的修造工作也普遍展开。在各式佛教造像中，最为突出的是金属制佛像的发展。由于此时冶炼技术和制作工艺的提高，创造出了精美而华丽的金属佛像，而且对佛像细部的表现也更加精致。（1-2-3）

西晋灭亡后，皇室与士族东渡，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而继东晋以后的南朝对于北方的混战来说，局势相对平稳，而且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比较繁荣。正如大批北方的官宦、文人、百姓大量南迁一样，众多的僧侣也纷纷南下，而由于此时佛教的普及、统治者的提倡，佛教开始了在南方的大发展。东晋和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思想领域较为活跃的一个时期，此时的儒、道、佛三家各有发展，而三者之间也不再是单纯的斗争关系，而是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过程，这段时期也是我国佛教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时期。

东晋最著名的僧人叫做慧远，他是西晋时期高僧道安的门徒，不仅精通佛法，还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家思想颇有研究。慧远青年时期出家随道安研习佛法，至44岁，后其南下，经过几年短暂的云游之后，居于庐山长达30年，并在庐山定居讲法直到圆寂。在庐山期间，慧远广收门徒，形成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僧团，成为东晋佛教领袖。除了培养广大门徒以外，慧远还派遣其弟子西行，到佛教发源地取经，也组织大规模的译经活动。慧远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因为他具备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所以他倾向于将西域佛法与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思想相结合，对关于佛教的一些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得出一定的结论，为佛教的本土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慧远对佛教发展的另一大贡献在于，他倡导设立了历史上称之为“白莲社”的组织，这也是日后隋唐时期，佛教重要的一个分支流派净土宗的前身，因此可以说，慧远还是净土宗的开山初祖。虽然慧远与当时另一位译经专家鸠摩罗什的一些佛教观点并不相同，甚至有时的心得和观点还发生矛盾，但也正是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才是推动中国佛教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劲动力。

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南朝的发展尤为兴盛，从东晋时起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有崇佛、敬佛的传统，尤其是帝王和上层统治阶级，对佛法尤其热衷。无论是帝王还是贵族官宦、寻常百姓，都以结交僧侣，研习佛经，讨论教义为荣，并积极参与慷慨捐资扶持译经、讲经及修建佛寺、塑佛像等活动。（1-2-4）僧侣的地位在此时也大大提高，不仅成为皇宫和各官府贵宾，并以此聚敛了大量的财富，甚至还开始干涉朝政，这也引起了一些大臣的警觉，一度引起了人们关于佛教与统治关系的论争。

在北朝就曾发生了两次灭佛运动（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运动有两起就发生于北朝），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有感于僧侣势力渐强，寺院大大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曾大量捣毁佛寺，下令使僧尼还俗，以削弱佛教对国家的威胁。虽然历史上的这些



灭佛活动持续时间大都不长，而且稍后却又继续更快速和更大规模地恢复，但总的来说对佛教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在北朝的两次灭佛活动中，大批僧侣纷纷迁移，或西行取经或南下发展，僧侣的迁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在全国的传播与融合，总的来说，南北朝的佛教还是在向前不断发展的。

1. 佛寺的发展

两晋南北朝，尤其是南北朝时期佛教建筑有很大的发展。由于早期的佛教只停留在对经文的翻译和归纳上，而且僧侣人数较少，所以僧侣多居住在官府用来接待宾客的礼制建筑中，我国古代常用一种称之为“鸿胪寺”的官府作为招待僧侣居住的场所。这是一种专门主管祭祀礼仪的官府，而“寺”在当时只是一种官署的别称，还没有专门指代佛教建筑的类型。自东汉皇帝将西域众僧所居住的“鸿胪寺”定名为“白马寺”起（1-2-5），人们也逐渐把这种佛教“三宝”（三宝：佛、法、僧）的所在地建筑称为“寺”。至此，我国才有了专门的佛教建筑称之为僧寺，再往后，各种佛教建筑的名称又不断发展和完善，终于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佛教建筑名称，即：在山壁上凿出的称为窟，供僧侣居住的建筑称为院，供奉佛像的建筑则称为庙。此外还有精舍、僧院、宝刹、福地等别称，其中佛寺的梵文为“僧伽蓝摩”，其意思是说僧人们聚集在一起，就如同树木组成的森林一样，因此佛寺又被称为丛林或伽蓝。早期小型的寺院还称为庵，后来则专指供女子出家人，即比丘尼居住的寺院。

南北朝时期各地都开始兴建佛寺或开掘石窟，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寺庙，现今保存的著名石窟，就有很多都是始建于此时，或此时进行大规模修建而扬名于世的。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南北朝的寺院建

观世音菩萨铜像

1-2-4（左图） 这尊东魏时期的佛像立于四脚台座之上，这也是当时佛教造像的一大特点，其台座上还铸有铭文。佛像最为特别之处，是有一个弧形的装饰性背光，为了平衡背光向外的伸展力，佛像底部的莲花座变得高而厚，这是展示当时铸造技术与科学认识发展水平的标志物。同时，长衣宽袖的服装样式，也是佛教及其造像汉化的表现。



筑多达千万所，可见当时佛教之兴盛。

早期的佛寺形制也沿袭自古印度，以佛塔为中心，在其四周设置各种用途的房间。这种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形式在中国表现为廊院形式，即以塔或高楼为中心，四周围以厅堂、回廊等相连，可以容纳众人在此念经和做法事。后来，随着佛教本土化的发展，以及帝王贵族等统治阶级的支持，佛寺也加入了一些符合中国传统礼法的建制，佛寺建筑的形制也发展到了亦中亦西的混合阶段。

最能代表这时期佛寺特点的是北朝兴建的永宁寺，这座寺院也是北魏时期洛阳城中规模最大的寺院。整个寺院的中心庭院中有一座永宁寺塔，塔周围建有佛殿和各类僧房，这种建制与印度佛寺建筑的建制相同。但整个永宁寺平面呈方形，四周有围墙相绕，围墙的建制与宫城类似。围墙的墙头上有瓦覆顶，而且四面各开有一门；南门有三层门楼、三个门道，与城门体制相同；东西两门也均有二层门楼、三个门道，这些也都是遵循城门的建制设置的；只有北门是一层的乌头门。这种方城和不同等级大门的形式都明显带有我国古代礼制建筑的特点，而寺中又严格遵守古印度佛寺建制，一所寺庙中糅合中外两种建筑形式的独特形式，也是佛教在我国不断本土化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南北朝时期由于全国崇佛，人们不仅大量捐建佛寺，舍宅为寺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出于不同的原因，许多私人的府宅被献给寺院，成为寺院建筑的一部分，或干脆成为小型佛寺。由于这些私人的府宅都是按照中国传统形式建筑的，都是纵向轴线的前厅后寝形布局，所以多把厅堂改设为供奉佛像的中心建筑，后部仍旧为僧舍，前部的庭院则作为开放性空间。这种佛寺的形式比较符合中国传统礼法，因此逐渐取代了中心式的布局结构，我国的寺院建筑也逐渐演化为纵轴对称，以院落为单位，多座院落组合而成的建制。除主轴上依次设置各主要殿堂以外，其他的院落多按照对称的方



白马寺

1-2-5 (左图) 位于河南洛阳的白马寺，从东汉时期以来一直在原寺址上重建或修缮，是我国有史记载的最为悠久的佛教寺院。东汉明帝曾经专门派人出使西域求取佛经，后引天竺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并以白马驮来大量的佛经，僧人所下榻的鸿胪寺遂改名为白马寺。此后，虽然各地所建的寺院都有被命名为白马寺的例子，但仍以洛阳白马寺为其始。